

W A R S T O R Y

战争事典

指文烽火
工作室 著

MOOK

036

17/10

并立于东亚大陆的狼与龙

匈奴的崛起与汉帝国的征服者时代

继业者血泊里走出的埃及女王

托勒密王朝首任女法老阿西诺二世传奇

转折点，还是无足轻重？

详解中法战争之镇南关大捷

德川幕府的前奏曲

关原合战前东西军的明争暗斗

好盔甲要满足哪些条件？

谈谈古代战场军人防护要素

以寡击众，死战不退

说说大明帝国嘉靖朝的悍勇武人

战争事典

WAR STORY 036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事典. 036 / 指文烽火工作室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68-1596-0

I. ①战… II. ①指… III. ①战争史-史料-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1893 号

战争事典. 036

著 者: 指文烽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俞滢荣

策划制作: 指文文化

视觉设计: 舒正序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596-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并立于东亚大陆的狼与龙

匈奴的崛起与汉帝国的征服者时代 / 2

继业者血泊里走出的埃及女王

托勒密王朝首任女法老阿西诺二世传奇 / 96

转折点，还是无足轻重？

详解中法战争之镇南关大捷 / 138

德川幕府的前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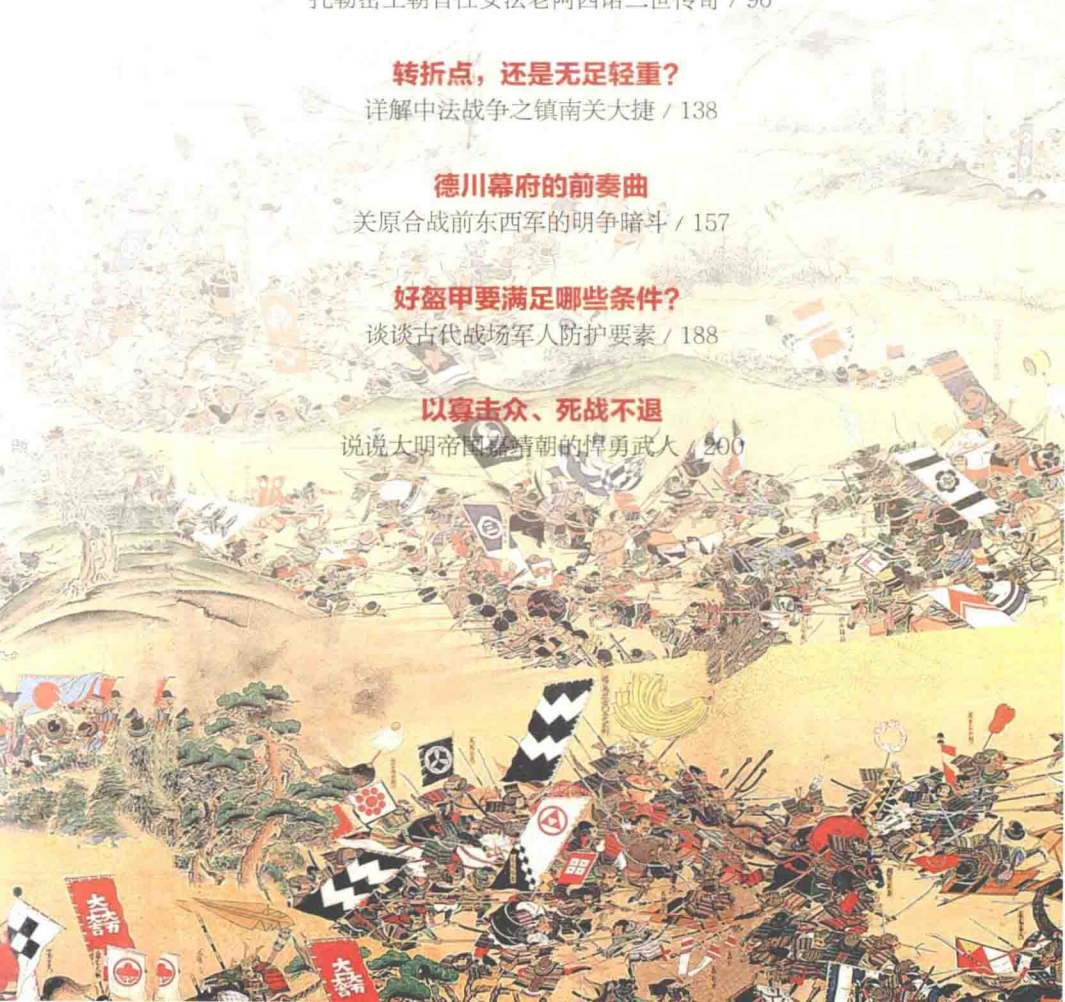
关原合战前东西军的明争暗斗 / 157

好盔甲要满足哪些条件？

谈谈古代战场军人防护要素 / 188

以寡击众、死战不退

说说大明帝国嘉靖朝的悍勇武人 / 200



前言

PREFACE

关于匈奴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这些纵横大漠草原的“天之骄子”到底来自何处？又是如何建立了辽阔强大的匈奴帝国的？其与汉帝国的冲突真是无法避免的吗？《并立于东亚大陆的狼与龙——匈奴的崛起与汉帝国的征服者时代》将解答所有这些疑问。

“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大名，对于很多历史爱好者来说可能是如雷贯耳。而《继业者血泊里走出的埃及女王——托勒密王朝首任女法老阿西诺二世传奇》所要讲述的，则是这位“埃及艳后”的先辈、希腊化时代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第一位女王——阿西诺二世·爱弟者在继业者战争里的恩怨情仇和传奇一生。

提及镇南关之役，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一定印象，毕竟历史课本上曾提到过。如果想知道镇南关之役的前因后果和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可以一览《转折点，还是无足轻重？——详解中法战争之镇南关大捷》一文。

曾有人戏称，关原合战是用不到6小时就决定了日本此后的200年的命运。然而，实际上决定会战胜负的不光是一线的对决与拼杀，更有之前长期的布局与准备、前哨战的激烈较量。决定日本未来命运也不会是那短短的6小时，而是自丰臣秀吉死后的政治博弈与利益纷争。这也是《德川幕府的前奏曲——关原合战前东西军的明争暗斗》所要讲述的。

盔甲作为古代战士们的重要防护装备，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已经相当遥远了。大多数人只是从影视作品或游戏中获得对古代盔甲的概念，也许存在很多的误解与想当然。《好盔甲要满足哪些条件？——谈谈古代战场军人防护要素》将从实战的角度，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盔甲是古代战场上的好盔甲，或者说好盔甲的几大要素。

土木堡之变后，明帝国对蒙古的战略转向防御。在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九边防御体系中，明军遭遇的最大难题就是在没有电话电报等现代联系工具的条件下，要守卫漫长的边境线。其结果就是明军面对蒙古骑兵的入侵，往往陷入兵力与机动的双重劣势。然而就是在如此困境下，却涌现出大量以寡击众、誓死捍卫边疆的勇武之士。《以寡击众、死战不退——说说大明帝国嘉靖朝的悍勇武人》一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烽火工作室主编：原廓

2017年10月



并立于东亚大陆的狼与龙

匈奴的崛起与汉帝国的征服者时代

作者 / 蔡传亮

南下的苍狼——匈奴草原帝国的形成

匈奴的起源

按照古籍记载，匈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关于匈奴的起源问题，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几乎全文照抄《史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三国时期的史家张晏称，淳维是在商朝初年流亡北方的。^①乐产的《括地谱》则有更详细的论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汉代和之前时代的文献中，匈奴的先祖是商汤灭夏之后，逃亡北方草原的夏族残余。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卷二十五》中虽然援引了这一说法，却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

此后，关于匈奴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古代学者因上古史料稀少，局限于索隐考据而无法深入研究。近现代学者则可以得到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等的帮助，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除了传统的夏族后裔说之外，尚有如下几种比较重要的说法：

第一，同种异名说。王国维先生在他的《鬼方昆夷獯豻考》中提出商朝时期的鬼方、昆夷、荤粥（Xūnyù，同“獯鬻”）、獯豻（Xiānyǎn，也作玁狁），春秋时期的戎、狄，战国时期的胡等，皆与匈奴“同种”。^②此说为20世纪以来多数学者所支持。

第二，义渠说。蒙文通先生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作品中认为匈奴的先祖是义渠，理由是《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而《战国策·秦策二》记载，同年义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下”。两史书互相参照，可知匈奴就是义渠。

第三，西来说。岑仲勉先生在《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中认为匈奴是“从西北

① “淳维以殷时奔北边。”

② “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徙来之突厥种”。孙次舟先生在《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中亦认为匈奴为西来的游牧民族，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至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出现于中国北方边境。

第四，北方草原民族说。此说最早由俄罗斯及蒙古国考古学家提出，在国内则创始于曹永年先生的《战国历史上的匈奴》。他认为先秦时代的匈奴只是当时北方许多不同族源的部落或种族中的一个，后来由于匈奴强大，草原各部族都被称作匈奴（“皆以为匈奴”）。这一学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研究匈奴的起源和族属并非笔者学力所及，也非本文的要旨，但我们依旧可以尝试着对匈奴的起源做一个大体的推断。

匈奴为夏后氏苗裔说不足为信，因为匈奴与夏族存在不同特征。第一，语言迥异。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匈奴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只是尚不能确定其属于突厥语族、通古斯语族还是蒙古语族，也有学者认为匈奴语属于已经消亡的阿尔泰语系第四语族（亦邻真）或三大语族形成前的“阿尔泰原语”（杨建新）。无论哪种可能，匈奴语都与华夏族所属的汉藏语系汉语族（原始汉语）存在明显差别。第二，体质不同。现挖掘出的匈奴墓葬中的遗骨显示，匈奴人种虽有欧罗巴人种或远东人种的成分，但以北亚蒙古人种（即古西伯利亚类型）为主，与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夏族明显



▲ 匈奴王冠（内蒙古博物院藏）

►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



不同（参见朱泓《体质人类学》）。语言和血统迥异的两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是一脉相承，但是匈奴确实与夏族存在某种渊源，匈奴风俗中有华夏族的遗风，如祭祀龙（“五月大会龙城”“岁有三龙祠”）、祭祀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尚黑（“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等等。因此匈奴先祖和华夏族早有接触固不待言，一部分北迁的华夏族在先秦时就融入匈奴联盟也大有可能。

义渠说和西来说缺乏依据。《史记》中所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匈奴参与五国伐秦之事为孤证，仅见于《秦本纪》，为其他史料所不载。而且匈奴即便参加了此次合纵攻秦行动，也不能证明匈奴就是义渠，因为两国可以同时对秦国用兵。何况义渠流行火葬，风俗和崇尚土葬的匈奴格格不入。

匈奴西来说，在匈奴进入中国北方边疆的时间和路线这一关键问题上，或与其他史料矛盾，或含糊其词，均难以确证。

王国维主张的同种异名说，将鬼方、昆夷、獯鬻、玁狁、戎、狄、胡^①都看作匈奴民族的“曾用名”，则是混淆了两类异族之间的区别。综合上古文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学的成果可知，鬼方、昆夷、獯鬻、玁狁、犬戎等戎狄系民族生活在冀北、晋北、陕北、宁夏、陇东等地，这一地带先秦时以森林草原地貌为主，属于农牧交错带；而匈奴、林胡、楼烦、东胡、月氏、丁零、屈射等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则在其北面的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阿尔泰山、天山北路、外贝加尔乃至南西伯利亚地区。

正如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早已指出的，戎狄并非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和上古的华夏民族一样从事农牧混合经济并兼营狩猎。如《左传》记载，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瓜州（今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处）之戎被秦国驱逐后，投奔晋国，被赐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南鄙之田”。戎人“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也修建自己的城邑。如《后汉书·西羌传》提到义渠、大荔筑城数十。他们在战争中也以战车和步兵为主，如康王时期西周对鬼方用兵，一次战役就俘获鬼方军队的战车一百余辆；又如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军与无终及群狄作战时，对方以步兵为主。这些特征都与“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的匈奴迥异，而与华夏民族更为相近。

^① 其中戎、狄为华夏族所加族名，鬼方、昆夷、獯鬻、玁狁、胡为其自称。

而且戎狄诸部族自上古时期开始就与华夏族有着时战时和、时亲时离的深厚渊源。早在五帝时代，黄帝就曾“北逐荤粥”。殷商时，武丁曾出击鬼方，经过三年商军才战胜了鬼方。周人与戎狄关系更为密切，太王亶父时期周人曾被戎狄驱赶到岐山（今宝鸡东北）；文王时攻伐畎（quǎn）夷；武王时将戎夷放逐到“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一度征服了戎狄；但是周穆王在位时，戎狄和周人开始交战，穆王虽然攻打西戎胜利，获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但周人与戎狄之间的盟友关系也彻底告终。终西周一朝，既有戎狄的入侵让周人损失惨重：“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岂不日戒，玁狁孔棘”；也有宣王中兴时对戎狄的打击：“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最终，西周因储位之争而与西戎中最强大的申国（周平王的母族）反目成仇，被申、曾和西戎的联军消灭，周幽王父子在骊山脚下被戎人杀害。申侯引狼入室，之后戎人夺取了泾河与渭河之间的宗周故土。

春秋初期，戎狄一度对中原诸国咄咄逼人。山戎曾越过燕国攻打齐国，齐釐公（齐僖公）率军在首都郊区才将其击退。44年之后，山戎又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将其击退。又过了二十余年，戎狄居然兵临东周首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攻打周襄王，将襄王驱逐到郑国。戎狄还拥立了襄王的异母弟弟王子带为天子，夺取了陆浑（今洛阳伊川），势力范围向东渗透到卫国。四年后，得晋文公出兵相助，戎狄才被赶走，王子带被诛杀，襄王之子得以继位。据《左传》记载，自闵公到宣公（公元前7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初），70年间，戎狄曾两次攻破成周，一度灭亡邢国、卫国、温国，多次侵入晋国、齐国、鲁国、郑国。其后，晋文公和秦穆公先后成为诸侯霸主，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秦国和晋国也就成为与戎狄交战的主力。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在圉河、洛河之间的赤狄、白狄，在陇山（今六盘山）以西的绵诸、緄戎、狄、獯，在岐山、梁山、泾水、漆水之北的义渠、大荔、



▲西戎创造的寺洼文化陶器

乌氏、胸衍。这场战争延续了数百年，直到战国中期，随着中山和义渠的覆灭才以华夏族的胜利而告终结。

另一方面，戎狄也和华夏有着密切的往来，彼此通婚不绝、血脉相通。西周伐商时西戎是其重要盟友，西周王室先后曾有两位戎人王后，东周襄王又曾娶狄女为王后。晋襄公时，瓜州之戎就称自己是晋国“不侵不叛之臣”。晋悼公曾派魏绛“和戎狄”，让很多戎狄部落“遂服于晋”。

值得一提的是，晋国公室与戎狄的通婚特别频繁。晋献公的夫人骊姬、大戎狐姬（晋文公的母亲）、小戎子都是戎狄女子。晋文公流亡时，狄人将一对姐妹献给他，文公娶了季隗为妻，将叔隗给赵衰为妻（后生下赵盾）。秦国的先祖也多次与西戎结亲，戎胥轩、大骆都曾娶戎女为妻。与之相比，战国后期之前，中原诸国和东胡、匈奴、月氏、丁零等草原民族接触甚少。

到了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离匈奴出现于中原视野的战国后期不过两百年时间，却已经不清楚匈奴的历史（“其传世不可得而次云”），何况其他了。

当然戎狄和匈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构成了匈奴的重要族源（详见后文）。

虽然匈奴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之说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其具体的形成过程依旧充满疑团。我们只能综合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狄宇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和《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武沐的《匈奴史研究》、乌恩的《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以及马利清的《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等研究成果，尝试着对匈奴的起源做一个推测。

公元前1000年左右（西周前期），受气候的干冷化、人口的增长、骑马技术的成熟和冶金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亚欧大草原的农牧混合人群普遍向游牧生活过渡。为了追逐丰美的草场，不断有游牧部落从寒冷的北亚地区呼啸南下。在西辽河流域和鄂尔多斯高地，龙山时代遗留下来的农业群落逐渐消亡或南迁，千年间当地人迹罕至，残存的居民生活也走向游牧化。约公元前600年（春秋晚期），来自今蒙古国和西伯利亚的游牧部落也迁徙到这一地区，征服（或融合）了当地居民，形成了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部族。尤其是前者，创造了辉煌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其特征为随葬动物纹饰的青铜装饰品和大量青铜武器、马具，并有大量

的牛马羊殉葬，而罕见陶器和农业工具。

同一时期，由于政治集权化、精耕灌溉农业的兴起和华夏民族意识的勃兴，实现部分统一的华夏诸国，尤其是秦、赵、燕三国，不断向北扩张。大批戎狄小国、部落被消灭，其民众不是融于华夏族，就是北逃到农牧交错地带。在长途逃亡中，他们无法带走房屋、农田和大部分家具，唯一能带走的财产就是牲畜和武器。这些北逃者虽然曾经从事农业并建筑城邑，但此时他们只能依赖畜牧和掠夺为生。几代人之后，他们已经丧失祖先原本有的农业定居生活技能和意识，

而和蒙古高原南下的游牧部落无异。至迟到战国中期，戎狄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消亡，融入华夏和胡人中。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直接走向接触和对抗。这也是战国中期燕、赵、秦三国与胡人交感和建设长城的大背景。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原本生活在今蒙古国中部偏北杭爱山一带的匈奴本部也从蒙古草原南下。他们在转变为游牧民族之后，属于石板墓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某种原因（可能是追寻温暖肥沃的牧场或是被邻近的游牧部落打败），他们于春秋战国之交南下，抵达阴山地带。由于林胡和楼烦在与秦国、赵国的战争中遭受重创，更为强悍的匈奴部落趁机征服了林胡和楼烦，并吸纳了当地的胡人及北逃的戎狄，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的统治部族虽然来自漠北，但其主要文化却传承了林胡、楼烦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并且吸纳了戎狄乃至一部分华夏族的文化因素。虽然后来这些原本血统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不同的部族都被称作匈奴，但是其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始终存在很大的差异。之后南匈奴和北匈奴的分裂也与此有关：南匈奴人种中有较多的东亚蒙古人种成分，与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的北匈奴不同。



▲鄂尔多斯式青铜剑

战国时代的匈奴

匈奴联盟出现之初，原本与中原各国并不接壤，其西南方向与义渠接壤，南面

与林胡、楼烦相接，东南方向与东胡毗邻。

由于战国时代列国兼并战争激烈，“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为了扩大版图、增加户口并消除后方威胁，赵、燕、秦三国不断向北方扩张。

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赵国出兵西略胡地，直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附近），拓地千里。林胡（今河套平原东部）、楼烦（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及内蒙古一部）被迫降服，向赵国提供马匹、军队。赵国在其故地上设置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雁门（治今山西玉右县）、代郡（治今河北蔚县）3个郡。

燕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82年），东胡（今辽河上游及内蒙古东部）入侵燕国，燕昭王派曾在东胡生活多年的秦开率军迎战。燕军不但收复失地，而且千里追击，将东胡赶到西辽河上游。燕国在东胡故地上设置了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辽东（治今辽宁辽阳）两郡。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宣太后诛杀义渠王，秦国出兵吞并义渠（今陕西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宁夏一部），在其故地设置北地（治今甘肃庆阳市）、陇西（治今甘肃临洮）、上郡（治今陕西绥德）3个郡。

秦、赵、燕的开疆拓土，让匈奴开始与中原各国接壤，而战争中大批胡人逃入草原投奔匈奴联盟，则让匈奴的实力大为增强。匈奴就此开始以百蛮大国的身份，进入中原列国的视野。

秦惠文君更元七年，匈奴首次见于史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这一年匈奴参加了反秦的合纵，但是史家们对此处出现的匈奴是否为司马迁臆断、误记一直争议很大。据刘向的《说苑君道》记载，燕昭王十六年（公元前297年）左右，燕昭王和郭隗交谈时，提到匈奴曾入侵燕国，“驱驰楼烦之下”。

总之，到战国后期，当时的态势已经是“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匈奴的势力范围扩展到秦、赵、燕三国的北部边境。为了防御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秦、赵、燕都在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但是战国时期三国的主要兵力都用于对付其他中原国家，秦赵之间、燕赵之间更是屡屡发生大规模战争，因此对北部的防御便显得兵力单薄。加之游牧骑兵拥有机动性优势，秦、赵、燕的对匈防御难免处于被动。

尤其是赵国，由于长期与秦国发生大战，损失十分惨重，仅长平之战就损失

45万士卒，国中精壮折损大半。匈奴趁机南下，占领了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阳山（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的狼山山脉）、北假（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阴山以南的夹山带河地区）、河南地（今河套平原），控制了赵武灵王时代修筑的北长城（沿着狼山山脉修筑）。当时



▲ 战国赵北长城遗址

的阴山、河套地区沃野千里、依山带水，气候湿润温和，草原和森林都十分茂盛，宜农宜牧，远比漠南更为适宜游牧部族生存与发展。匈奴占领这一地带后经济实力大增，也更便于获得中原的技术和物资，所以更有实力侵犯中原诸国，尤其是赵国。在此情况下，赵国派李牧驻守雁门，并授予李牧大权，可以自行委任官员，并且边郡的税赋不需上交朝廷，均由李牧幕府自由支配，作为边军的军费。

李牧出镇雁门后，针对匈奴骑兵众多、机动性强，赵军无法与其正面对抗的现实情况，认为赵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打败匈奴，制定了“避敌锋芒、耗敌锐气”的积极防御策略。他改善士兵的生活，每天都杀牛让战士们分食，“厚遇战士”以激励士气；训练士兵勤习射骑，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强烽火警报系统，派出众多的间谍侦察匈奴的军情。李牧下令，匈奴入侵时赵军应及时掩护百姓进入城塞，但不得与匈奴军交战，否则军法从事（“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当匈奴入侵，由于烽火和间谍的及时警报，百姓都得以迅速避入城塞中，但赵军都不出城与匈奴交战。虽然赵国军民都没有死伤损失，但不仅匈奴以为李牧怯战，赵国边军也因立功心切，对这位无法给他们带来军功的将领不满。急于解决匈奴问题的赵王要求李牧出击匈奴，遭到李牧拒绝。赵王大怒之下将李牧撤职召回，派其他人出镇雁门。

新将领上任后，为了讨好赵王和边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屡次与匈奴军队交战，却接连失败，不但赵军损失惨重，边地民众也无法正常地耕种放牧。赵王无奈之下只好又请李牧出山，李牧称病闭门不出。赵王强行让他出镇边郡，李牧得到了赵王不干涉其军事指挥权的承诺后，才重新执掌北方防务。李牧重新上任，继续采取以前的政策，匈奴数年间无法大肆劫掠，都以为李牧真的是怯战之辈，变得骄狂

而烦躁。赵国边防军不断得到赏赐却无法出战，因而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急于立功报恩。李牧认为时机已到，便集结 1300 乘战车、13000 名骑兵、敢死之士 5 万人、弓箭手 10 万人，日夜训练，做好了战斗准备。为了引诱匈奴出战，李牧命令边地牧民在边境上放牧（“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开始还疑心有诈，先派小股部队去试探，赵军佯装败退，委弃数千人畜。匈奴单于早就认为李牧怯懦，此时更不疑有他，便率领大军入侵。李牧以正面部队摆出阵势牵制匈奴军，左右两翼则包抄夹击，匈奴军被杀死十余万人。追随匈奴来犯的襁褓（今山西北部与内蒙一部）、东胡、林胡都遭到重创，匈奴单于向北逃走。其后十余年间，匈奴不敢入侵赵境。

李牧虽然赢得了抗匈战争的巨大胜利，消灭匈奴骑兵十余万人，但是在长平之战的重创下，赵国军事力量已大不如初，而且主要防御方向是西面的秦国，因此赵国未能完全恢复赵武灵王时期的旧疆，李牧也被调往对燕战场。

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 236 年），趁赵国与燕国交战两败俱伤之机，秦军王翦、桓齮（yǐ）、杨端和攻打赵国，夺取九城。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 234 年），秦国又派将领桓齮继续攻赵。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之战中，赵将扈辄被杀，赵军 10 万人战死。赵国连忙派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大败秦军，秦将桓齮战败而逃，李牧因功被封为武安君。但次年，桓齮又卷土重来，连克宜安、平阳、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 232 年），秦军又攻打邺（今河北临漳西北）、狼孟（今山西阳曲）、番吾（今河北灵寿西南），但在番吾再次被李牧打败。秦王政十八年（公元前 229 年），秦国在灭韩之后，趁赵国内部发生旱灾、人心不稳之机，再次派王翦、杨端和攻赵。在秦军的攻势下，井陘沦陷、邯郸被包围，赵国派李牧、司马尚抵抗，秦军无法继续前进，双方僵持一年之久。屡屡被李牧挫败的秦国只好使出反间计，派间谍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李牧、司马尚想要谋反。昏庸的赵王居然中计，派赵葱、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司马尚被罢免，李牧则因拒不受命而被杀害。一代名将没有被强大的匈奴和秦国打败，却殒命于昏君奸臣之手，赵军士气为之瓦解。仅仅 3 个月后，王翦就灭亡了赵国，赵葱被杀，赵王迁及颜聚被俘虜。

秦匈之战

李牧被杀、赵国覆灭后，秦国又忙于讨伐其他诸侯国，一度受到抑制的匈奴得以趁机重新入侵北疆，夺取了多个郡县，并以河南地为基地威胁关中。此时的秦王

政正忙于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在灭亡六国后又忙于建立帝制、加强中央集权、镇压六国残余势力、统一度量衡等内政，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 年）之前，均无法将主要力量用于对匈奴开战。但是秦始皇毕竟是位大有为之君，他虽然暂时无法对匈奴开战，战备活动却没有放松。

秦始皇的举措中，第一项是选主将。灭齐统一天下的当年，秦始皇就将年轻的蒙恬调往上郡，负责关中地区的对匈防务。蒙恬出身将门，其祖父蒙骜从秦昭襄王开始就为秦国效力，官至上卿，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蒙骜曾于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 249 年）攻打韩国，夺取成皋（又名虎牢）、荥阳，立为秦国的三川郡；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 248 年）又奉命攻赵，取 37 城。嬴政继位后，蒙骜依旧是秦军大将，于秦王政三年（公元前 244 年）率军攻韩，取 13 城；秦王政五年（公元前 242 年），率军攻魏，取 20 城。秦王政七年（公元前 240 年），蒙骜去世。其子蒙武于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 224 年）做王翦的裨将，追随王翦攻打楚国，杀死项燕；次年蒙武再次率军攻打楚国，俘虏楚王。蒙恬为蒙武之子，曾学习法律，担任典狱官，是一位出色的文法吏，据说还是毛笔的发明者；他曾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率军攻打齐国，因为战功被拜为内史，可谓文武双全。让这样一位优秀的世家子弟长期驻军上郡（“暴师于外十余年”），既是为了保护关中的安全，也是为了让蒙恬熟悉北地的地理形势和匈奴军队的作战特点，积累作战经验，为将来的对匈作战塑造一位合格的主将。

第二项是修长城。匈奴的优势在于骑兵的机动性为中原军队所不及，因此早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就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秦帝国统一天下后，与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的边界长达数千里，不可能处处派重兵驻防，因此必须修筑长城，以阻滞骑兵的攻势，并在反击时保护主力部队的侧翼和补给线。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便开始浩大的长城工程，秦长城以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北长城为基础，重新修筑了被匈奴破坏的赵武灵王所筑阴山南长城，将赵长城与燕长城连接起来，并将燕长城延伸到鸭绿江以东。在西段，秦人则加固了秦昭襄王时期修筑的长城，赵长城和旧秦长城之间的空隙则由黄河“以河为塞”来填补。至此，“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长城防线构建完毕。

第三项是备后勤。冷兵器时代交通运输条件有限，大规模动兵消耗巨大，后勤补给十分重要。出击匈奴需要在草原上千里作战，无法取粮于敌，从内地输送粮食等物资也十分艰难。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便开始了修建驰道和储备粮食的工程

（当然这么做还有巩固统一成果、个人巡行炫耀等其他考虑）。

与匈奴作战有关的驰道主要有三条：从咸阳向西北直达北地，再从回中转入陇西郡的驰道；从咸阳经渭河河谷直达陇西的驰道；从咸阳向北经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治今河北怀来县）、渔阳（治今北京密云）、右北平（治今内蒙古宁城县）直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碣石山）的驰道。有了驰道，不但便于调动军队，也有利于运送粮草辎重和传递军情，驰道可谓秦军出击匈奴的生命线。

大军出征塞外，粮食供应尤为重要。李斯就曾以“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为理由反对对匈开战（《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纳李斯的提议，但并非不了解粮食供应对北征匈奴的重要性。秦初关中已有咸阳仓、栎阳仓、霸上仓三大粮仓，中原有敖仓、陈留仓、宛仓，但两者皆属国家用于最危急时刻的战略粮库，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动用。因此始皇帝又在山东地区新修建了黄仓（今山东黄县）、琅琊仓（今山东胶南琅琊台）和腓仓（今山东福山），作为北伐大军的主要粮食供应地。

在完成上述筹边备战准备的同时，秦始皇还多次北上巡行，视察防务，部署战略：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巡行陇西郡和北地郡，视察西北防务；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山东，先后视察了黄仓、腓仓和琅琊仓；秦始皇三十二年，巡行北边，从上郡开始，视察了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云中等地，直达碣石，渡海而还。此后，他做出了派遣蒙恬率30万大军出击匈奴、夺取河南地的决策。虽然《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此事归结于燕人卢生所献图讖——“亡秦者胡也”，但从秦始皇周密的筹边部署来看，即便所谓的“亡秦者胡也”不是后人编造的故事，也仅是促使秦始皇下决心出击匈奴的一个次要因素而已。

秦始皇三十二年夏秋时节，蒙恬率领30万秦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作战，战争的目标是夺取河南地。秦始皇之所以选择河南地为进攻目标，是因为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不可能彻底消灭匈奴，也不可能在这千里战线上同时出击。夺取河南地，既可以解除匈奴对关中的威胁，也可以以此为基地，进攻阴山和贺兰山的匈奴军队主力，从而消除北方边患。

夺取河南地的战斗十分顺利：蒙恬亲率主力从上郡出击，攻取河套北部；陇西和北地的秦军则由杨翁子率领从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出击，攻取河套南部。由于秦军做了周密的部署，而匈奴的主力骑兵还在阴山和贺兰山，因此面对秦军步兵、